

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

洪修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

洪修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洪修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004-9260-3

I. ①中… II. ①洪… III. ①儒家—中国—文集②佛教—中国—文集
③道教—中国—文集 IV. ①B222.05-53②B948-53③B9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1961 号

责任编辑 夏 侠 雁 声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25 插 页 2

字 数 380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自汉代佛教传入，其与儒道构成的三教关系，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学术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中华思想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的走向。因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儒佛道三家各自历史与思想的研究全面展开和日益深入，对三教之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就越来越呈现出来。

我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大概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我在研究中国佛教的同时，也一直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教学和科研的关注点。记得当年我在做禅宗研究的博士论文时，就是从三教关系着眼将禅宗视为以佛教为本位的三教合一，并据此选题和展开研究。^①1988年，我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南京大学任教。当时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还比较少，南京大学对这些青年教师非常重视，我刚毕业不久，还没有高级职称，就获得了硕士生导师的资格，开始指导研究生，并开设硕士生学位课程。我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为“儒佛道三教与中国哲学”，从1990年开始，分别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后来又给博士生讲授三教关系的课程。屈指算来，自己正式开始从事与三教关系相关的教学与科研，前后正好二十年了。看到这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三教关系的研究中来，相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我感到很欣慰，说明当年自己的选择还是很有意义的，也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回想起来，在刚开始的阶段，还是遇到了许多困难，其中之一我至今记忆犹新，对此我曾在拙著《中国佛教文化历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的自序中写道：“有一种看法认为：研究佛教就只能把精力集中在佛教，若杂以对

^① 请参阅拙著《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0年修订版）。

其他学说的研究，就有大而化之不务实或好高骛远之嫌。记得前些年我准备从事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研究时就有人觉得，穷一生精力研究佛教还很难说能研透佛教，年轻人竟想同时搞三教？很不以为然。似乎研究佛教就只能读佛书，只有那种就佛研佛式的研究才算研佛。”但我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佛教文化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但它是与其他文化形态和社会现象相联系而存在的，不能把它孤立起来加以研究。特别是研究中国佛教，更是如此。中国佛教之所以叫‘中国’佛教，就在于它既是佛教，又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中国化的佛教。所以，要了解中国佛教，就必须了解中国的社会和传统的儒、道等思想文化。而要了解汉以降的中国社会和儒、道等传统思想，也必须了解中国佛教文化。通过各种文化现象的比较研究，有时更容易发现佛教的特点，也更能挖掘佛教的现代意义与价值。事实上，儒佛道等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怎么能割裂开来呢？有时我甚至认为，即使研究先秦的儒、墨、道、法，知道一点佛教也是有益的。因为人类文明都有某种共性，都是在探讨人类自我生存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并为人类自身的生存而服务的，虽然它们的表现形态常常不一样，表达的具体内容和观点也往往不同。了解其他的思想学说，对深入了解儒道等文化精神，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启发作用。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岂能一叶障目，人为地狭窄自己的眼界呢？现代佛学专家汤用彤先生精魏晋玄学，通宋明理学，不仅没有影响他成为佛学大家，反而使他的佛学研究独树一帜。我愿以他为榜样。”更多的师长也都给我鼓励，使我当时申报的课题“儒佛道三教关系史”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正是由于师长和朋友们的鼓励，我在教学和科研中，一直对三教关系进行着思考和探索。拙著《中国佛教文化历程》也是本着这样的基本看法和思路撰写的，后来有学者以《三教关系下的佛教》为题对此书做了评论，认为“儒佛道三教关系成为《历程》写作的一个指导思想，当然也成为《历程》与其他同类著作相区分的一个显明标志，也表现了这本书的独有特色”（《佛学研究》1996年刊）。

1993年，我在授课讲稿的基础上修改完成了《儒佛道与中国哲学——三教关系史与论》一书的初稿，同时与南京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但由于当时应出版社之邀，正在全力赶写《中国佛教文化历程》，此书直到1994年8月才完稿，交稿后一周，我便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一年。1995年夏回国以后，我就

抓紧把自己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结项，同时希望抓紧时间修订完善《三教关系史与论》的书稿。

但身在“江湖”中，往往会身不由己。除了日常的教学和指导研究生，许多科研任务经常会挤进来而打乱了自己原有的研究计划。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同感：学校组织的项目、学术前辈主持的项目、朋友之间邀请的项目……很多都是比较难以拒绝的，而这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样，随着《中国禅学思想史》、《惠能评传》、《如来禅》、《中国儒学文化大观》、《肇论注译》、《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国学举要·佛学卷》、《儒佛道哲学名著选编》、《中国思想学说史》（隋唐卷）、《中国佛学之精神》等专著、参著或主编的书一一问世，自己对三教关系的系统研究却一直未能集中精力全面展开，《三教关系史与论》的修订也一直被拖了下来。而随着每年的教学与科研，包括完成上述这些科研项目任务，也不断积累着有关三教关系的知识与研究心得，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更是在不断地推进，这更使自己觉得原有的书稿不进行大的修改，就拿不出手了，故出版社虽然几次催稿，但我都婉言推辞了。《三教关系史与论》一书也因此而至今未能出版，常常引以为憾！希望能结合自己目前的研究，在吸取学界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弥补上这个缺憾。

当然，三教关系的研究一直是我多年来喜爱和关注的专题，虽因诸事干扰，却也一直没有停止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不断积累的研究心得虽未得充分的时间系统表达，但还是利用各种机会从不同的角度撰写了一些文章，表达了自己对儒佛道三教关系的一些基本看法及专题研究。本书所收录的就是这方面研究内容的一个汇集。虽然这些论文距离自己多年来预期的目标还差很多，但毕竟记载着自己这些年来的探索与思考，收集在此，敬请学界朋友批评指正，以作为自己下一步继续努力的动力与方向。

我个人认为，儒佛道三教关系，既可以进行综合性的整体研究，也可以进行专题性个案研究。即使是综合性的整体研究，有时也有一个分别从儒或佛或道为进路来研究的问题。由于我自己的学术背景是佛教研究，因而许多文章还是从佛教研究为进路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项研究的工程浩大，需要多方面的力量一起来努力。同时，对三教关系进行专题性个案研究，并不一定就须同时涉及三教，其中任何两家的关系，也应该是三家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并深化对三教关系的研究。所以本书“附录”中博士生课程中佛教传入之前儒道的关系也被列为三教关系的重要内容。对此，也欢

迎学界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共收录论文 23 篇，基本上都是过去 20 多年来陆续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哲学史》、《哲学与文化》等海内外学术刊物上与三教关系相关的学术论文，在每篇论文的末尾都分别注明了出处和时间。考虑到本书的整体性，论文收录时，个别标题和内容或文字略有修订或调整。论文按主题或内容，分为总论篇、分论篇、比较篇、专论篇四个部分。总论篇是对三教关系历史展开及其与中国思想文化、中国文化特质之关系的总论。分论篇是以三教关系为视角，分别对儒佛道三教各自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或文化精神的探讨。比较篇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儒佛道三教或其中两家某些问题、某些观点的比较研究。专论篇则收录了几篇讨论不同时期与三教关系相关的问题的专题论文。

除了以上四个部分的内容之外，本书的“访谈篇”收录了几篇海内外学术刊物对本人学术经历和学术研究思考的访谈录，其中记载了本人有关三教关系研究的一些思考，故收录于此，以供参考。“附录篇”则收录了本人开设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相关课程的教学提纲，既供参考，也欢迎批评指正。

最后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其一，本书题名加上“中国”，是为了突出本书所说的儒佛道三教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儒佛道，因为大家知道，儒佛道的传播发展的范围是并不限于中国的。其二，本书所说的“三教”之教，是在“教化”的意义上使用的，主要是指“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因为儒学是否是宗教，还可以再讨论，但称儒佛道为“三教”，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了^①，认为儒佛道这三家都具有辅助王化、教化民众的社会文化功能，故以“三教”名之^②，所以讲“三教”关系，并非意味着就是把儒家视为宗教了。其三，论文中有几篇是与人合作完成的，征得合作者同意后收录于此，并向合作者致谢（《“完人”人格》与徐长安教授合作，《谈〈儒藏〉的编纂》与隋

^① 如北周道安的《二教论》中说：“然三教虽殊，劝善义一。途迹诚异，理会则同。”《周书》卷五《武帝纪上》记载说：“建德二年……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北史》卷十《周本纪下·周高祖纪》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在南北朝至隋唐期间，曾多次举行过由帝王召集主持的“三教论衡”的公开辩论，也有《三教论衡》（唐代白居易作）和《三教平心论》（元代刘谧著）等著作存世。

^②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历史上“三教”之称，说的就是三种宗教。请参阅李申教授的《中国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与《中国儒教论》（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等有关论著。

思喜博士合作，玄禅人生观和社会观比较的两篇文章与孙亦平教授合作)。其四，由于前两年本人曾出版了一本佛学方面的论集《中国佛教与儒道思想》(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年版)，有些论文为避免重复，本书就没有再收录(例如《论儒佛道三教人生哲学的异同与互补》、《也谈两晋时代的玄佛合流问题》)，但也有一些文章因为本书体例和内容的需要，仍然予以收录(例如《试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精神》、《明代四大高僧与三教合一》等)，特此说明。

完成本论集的编撰，心中并没有觉得特别的轻松，反而有种“路漫漫其修远兮”、“任重而道远”之感。本人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宗教的发展及精神”的课题研究。尽管由于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兼任馆长以后，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受到很大影响，但收集资料倒也比以前方便了不少，还学会了许多在网络时代搜寻、获取海内外文献资料的新方法，本人将扬长避短，尽最大努力来把当前这个课题认真做好。希望以本书的出版为新的起点，在不远的将来能拿出新的成果以丰富三教关系研究的学术园地，也了却自己多年来的学术心愿。

洪修平

2010年3月16日于南京大学图书馆

目 录

自序	(1)
----------	-----

总论篇

论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历史展开	(3)
从儒佛道三教关系看传统文化的“人学”特质	(22)
从儒佛道三教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完人”人格及其历史价值	(37)
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	(48)
儒佛道三教与当代社会的转型	(60)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and Chinese Philosophy (儒佛道三教与中国哲学)	(66)

分论篇

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77)
从国学和儒学内涵的演变谈《儒藏》的编纂	(91)
试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精神	(106)
论道家道教思想的曲折发展及其现代意义 ——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118)
老子、老子之道与道教的发展 ——兼论“老子化胡说”的文化意义及佛道之争	(128)

比较篇

- 论中国佛教人文特色形成的哲学基础
——兼论儒佛道人生哲学的互补 (143)
- 佛教思想理论的中国化与三教关系 (154)
- 论道家、佛教眼中的知识与智慧
——兼论中国禅宗的“自性般若”的思想 (167)
- 老庄玄学与僧肇佛学 (177)
- 性情与人心：试论玄禅人生观的异同 (189)
- 名教、自然与佛法：玄禅的社会观之比较 (203)

专论篇

- 佛教般若思想的传入和魏晋玄学的产生 (213)
- 三教关系视野下的玄佛合流、六家七宗与《肇论》 (223)
- 隋唐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学术影响 (239)
- 略论禅宗三教合一的中国化特色 (253)
- 论三教合一的禅宗是传统哲学发展的重要环节 (263)
- 明代四大高僧与三教合一 (271)

访谈篇

- 宗教情怀与真理认知
——洪修平先生访谈录 (285)
- 纵横禅学与中国哲学
——佛学学者洪修平 (294)

回归佛陀的本怀	
——洪修平教授访谈录	(300)
觉悟人生,群心向善	
——洪修平教授访谈录	(308)

附录篇

儒佛道三教关系史与论	(317)
儒佛道三教关系专题研究	(327)

总论篇

论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历史展开

印度佛教在两汉之际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便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儒佛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中国佛教得到了不断发展，而佛教在中土传播发展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一部三教关系史。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本文拟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的发展，从中国佛教的发展中来把握三教关系的历史进程，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一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它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佛教不仅非常懂得“入乡随俗”的重要性，而且它本身也具有适应环境的内在机制，因此，在它传入中国以后，就以“随机”、“方便”为理论依据，十分注意与中土原有的思想文化相适应。人们常说，佛教自传入始，就开始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从思想理论上讲，佛教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的道化和儒化，三教关系也就由此而形成并逐渐展开，而外来佛教的道化和儒化最早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表现出来的。

从历史上看，佛教自两汉时经西域传至中国内地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它只是被当作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而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百姓很少接触，基本没有汉人出家为僧，少量的佛寺主要是为了满足来华的西域僧人

居住和过宗教生活的需要。到东汉末年，佛教开始在社会上有进一步的流传。随着西域来华僧人的增多，译经事业日趋兴盛，大小乘佛教都于此时传到中国，流传下来的佛教史料也逐渐丰富起来。据现有的资料看，东汉时的佛事活动以译经为主，而最早的佛经翻译家为了迎合中土的需要，就在译经的过程中融会吸收了传统的哲学、伦理和宗教观念，从而使佛教逐渐在中土站稳脚跟，并最终跻身于华夏文化之中，成为与儒、道并列的中国思想文化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把“释迦牟尼”译为“能仁”，迎合了儒家的圣人观念；把“世尊”译为“众佑”，使释迦牟尼又成了福佑众生的神灵；而把“无我”译为“非身”，则使佛教与传统的灵魂不死观念相沟通成为可能。

在汉代佛经的翻译中，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迎合特别表现在对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的借用上，因而汉代的译经儒化和道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以传为第一部汉译佛经的《四十二章经》为例^①，此经的内容重点宣扬了佛教的人生无常和爱欲为蔽等思想，但行文中却夹杂着“解无为法”、“行道守真”之类的道家思想和“以礼从人”之类的儒家语言。就连此经的文体也模仿了儒家经典《孝经》。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曾引旧经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继《四十二章经》之后出现的汉译佛经，也都程度不同地打上了儒道的思想烙印。

根据现有记载，最早来华的译经大师是安世高，在他译出的佛经中就广泛使用了中国道家固有的“元气”、“无为”等概念，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佛教的原义。例如，按照佛教的观点，“夫身，地水火风矣”^②，人身乃地水火风“四大”组成，但在安世高所译的《安般守意经》中却有“身但气所作，气灭为空”^③的说法，不但用“气”替代了风，而且用气来概括“四大”，代指人身。这虽然与佛义相左，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为佛经译注家所继承。安世高还以“无为”来解释佛教的安般守意，表示“涅槃”之义。安般守意，“安名为入息，般名为出息”^④，原意为通过数出入息而守住心意，消除烦恼，领悟佛教真谛，最后达到涅槃解脱境界。这与道家的清净无为显然不是一回事，但《安般

① 这是一部介绍小乘佛教基本教义的佛经，关于此经的译者、译时、译地，历来异说纷纭。一般认为，它是一种经抄，而不是一部独立的佛经，主要摘译自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

② 《六度集经·布施度无极章》，《大正藏》第3册，第16页上。

③ 《大正藏》第15册，第169页下。

④ 同上书，第165页上。

守意经》中却说：“安谓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① 经中还直接用“无为”来表示涅槃义：“安般守意，名为御意至得无为也。”^② 要求人们在数息时排除对外物的思虑，专心一致地按照佛经经义去修行，以追求“无为”的涅槃之境：“无者，谓不念万物；为者，随经行；指事称名，故言无为也。”^③ 比安世高稍晚一点来到中国的汉代译经大师是支谶，他主要译介的是大乘般若类经典。在其译出的《道行般若经》中，也借用了“本无”、“自然”等概念来表示佛教“缘起性空”的基本思想，如译“诸法性空”为“诸法本无”^④，用“色之自然”来表达“色即是空”^⑤，这显然都是受了道家“有”、“无”、“自然”等概念的影响。汉译佛经的老庄化倾向不仅有利于佛教思想在中土的传播，而且也加深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影响。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玄佛合流的出现，都与此深有关系。^⑥

汉代译经还十分注意对以儒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迎合。佛教作为一种追求出世的宗教，其宗教理论和修行方式都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有许多不一致之处，例如佛教倡导的众生平等、出家修道就是与儒家君臣父子的纲常名教和修齐治平的道德修养、政治理想相对立的。但儒家的伦理纲常是宗法封建制度的立国之本，佛教要在中国传播发展，必须与之调和妥协。因此，汉代译出的佛经就在许多方面为适应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而做出了调整。例如安世高所译的《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或者将原文中与儒家孝道不相一致的内容删除不译，或者另外加进了子女应奉养父母的教训，而把原文中夫妻、主仆平等的关系又译为丈夫高于妻子、奴婢侍奉主人，等等。汉代译经出现的迎合中国儒家伦理的倾向在以后的译经中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乃至在唐代甚至出现了中国人编的《父母恩重经》等专讲孝道的佛经。

汉代译经对儒、道等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依附和对传统固有的名词概念的

① 《大正藏》第15册，第164页上。

② 同上书，第163页下。

③ 同上书，第170页上。

④ 《大正藏》第8册，第450页上。

⑤ 同上书，第441页下。

⑥ 关于佛教般若学对玄学的影响，请参阅本书收录的拙文《佛教般若思想的传入和魏晋玄学的产生》和王晓毅的《王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借用，为汉魏间格义佛教的流行创造了条件。所谓“格义”，就是引用中国固有的思想或概念来比附解释佛教义理，以使人们更易理解并接受佛教。一般认为，这种方法始创于晋代的竺法雅。《高僧传·竺法雅传》中说：“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其实，这里只提到竺法雅用格义的方法，并没有提及是他首创。从实际情况来看，早期译经用“无为”来译“涅槃”，把“释迦牟尼”译为“能仁”，以至于当时人们往往以传统的周孔之教和老庄之道来理解佛教，就可以视为是格义的最早运用。

“格义”的出现，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必要性。由于佛教的思想和常用的名言概念等都与中国传统的有差异，再加早期译经的不完善和道化、儒化的倾向，使人们一下子很难把握佛理，因此，人们便自然而然地以自己熟悉的传统思想去比附理解佛教，“格义”的方法由此而产生，并很快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汉魏佛教的重要特点之一。随着佛经的大量译出和人们对佛教的全面把握，魏晋以后，“格义”才逐渐被废弃不用。但也有一些比附配合仍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中国化佛教的一部分。例如在汉魏间的一些佛典译文和注释中常常出现的以儒家“五常”来比拟佛教“五戒”的做法，就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一种定论。

二

三国两晋时期，佛教在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中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社会的分裂与动荡不安，百姓的苦难与被拯救的渴望，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使佛教得以赶超中土原有的各种宗教信仰而与传统的儒、道并存并进，为隋唐时期与儒、道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奠定了基础。

三国时期的佛事活动，仍以译经为主。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是支谦和康僧会，他们俩都是祖籍西域而生于中土，深受中土文化的影响，他们在译出佛典的同时还注经作序，其译述不但文辞典雅，而且善于用儒、道等传统的名词术语和思想理论来表达佛教思想，进一步推进了佛教的中国化。例如支谦在其所译的《大明度经》中一方面比较准确地用“空”这个概念来表达般若